

1103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二十九期

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1年7月15日

目 录

“文革”逸事	褚离贞(1)
回忆三塔及其重建	黄国华(26)
石牌坊	朱培林(35)
中山路的历史变迁	吴 梁(37)
后记	(43)

“文革”逸事

褚离贞

祖父褚辅成先生是在1948年3月去世的，同年9月我降临到人世。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说祖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是民丰造纸厂的创始人之一。可是在那个年代里，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会给我投来蔑视的眼光，在我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很努力，生活得也很累！

一颗红心多种准备

1964年，我初中即将毕业。学校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要我学习上海知青鱼姍姍，背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选择人生道路，并要我带头写申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我的性格很倔强，我写了。我已完全做好了支边的思想准备。升学考试后，虽然我知道自己的成绩考得不错，数学考了满分，但因种种原因，我对升学的信心不足。妈妈虽然心疼我即将可能远行，但是她还是为我做好了准备，为我准备了两只皮箱……没想到开学前，我在去母校东栅中学的途中遇上了王健康老师，他告诉我已经考取了嘉兴一中，我以为他在哄我，王老师说你不信你马上回去等通知！我终于高高兴兴地跨进了嘉兴一中的大门。

到了嘉兴一中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参加校田径队和篮球队的训练。这段时间，班里的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学习和生活都很充实，也很快乐。

大约在1966年4、5月间，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6月间，我们大家正在紧张地复习迎考。一天早晨，学校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台正在播放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反正从我们进校以后已经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时我们一边上课一边斗争，因此我们继续在复习功课。

过了没几天，一批北京高校的红卫兵来到我们学校，来点所谓的“革命之火”。他们首先把老师集中起来训话，叫老师们互相揭发或自己坦白交待问题。同时，他们叫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口号，并在学校的墙上刷写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标语……他们甚至把留长辫子、穿小裤腿都说成是封、资、修现象。于是第二天就出现有红卫兵在路口上设卡剪女人长辫子、剪小裤腿的现象。

那时的人最怕被人说成是不革命的。因此，这股风很快就刮开了，学校里的学生、工厂里的工人、农村里的农民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对一些所谓的怀疑对象到处进行抄家。

因为我祖父是民丰厂的股东，父亲又是电气工程师，所以被套上“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又因为我家有海外关系，因此，我们总是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红卫兵来我家抄了三次。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许多权利被剥夺了：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我们没份；上台唱革命歌曲的权利，我们没份。这对一个平时什么文体活动都积极参加的我来讲，心灵上的打击尤为沉重。当时我们每次开会或文艺演出都是以班级为方阵排座的。等轮

到我们班大合唱时，其他同学都上台去了，我们班这块地方只剩下我、高继玉和余知信等四、五个同学，其他班级的同学都用同情或歧视的眼光看着我们。那时的我真想有个地洞钻进去，真想放声大哭！但又只能强忍着眼泪。此情此景，在我的记忆里是那么的深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第一次步行去上海，工人大叔给予温暖

嘉兴一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乘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后，学校里就叫我们回家“闹革命”。约过了四五天以后，我回到学校，教室里已空无一人。我正打算下楼，高继玉正好从楼下走上来。我们俩在一起商量了一会，觉得其他同学都出去了，我们留在学校干吗？我们也是要革命的。他们不让我们去见毛主席，我们自己可以走到上海，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也好。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我赶忙回去向母亲要了点零花钱和全国粮票，各自背上书包，带上毛巾、牙刷就出发了。

我们是沿着铁路走的，第一天一直走到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走到石湖荡车站。我们身边既没有介绍信，又没有足够的钱住旅馆，因此我们就坐在车站过夜。起先车站上的人还多，我们坐着打盹还没事。可是后来这小站上的人都上车后，晚上车站要关门了，一个铁路工人走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走？我们对他说，想坐在这里过夜，明天再走到上海去。他同情地说：“你们坐过夜怎么行呢？还是到我家去住一宿吧！”我和高继玉俩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将信将疑地没作声。他看出我们在害怕，就对我们说：“你们不用怕，我带你们去看看再说吧！”于是我们就跟着这位老工人走过了车站前的一段斜坡，又拐了几个弯，来到了铁路宿舍。大叔领着我们走进

家，对他的妻子说明了我们的情况，请她照顾我们住一夜。随后他就回去上班了。大婶热情地把已经熟睡了的儿子抱开，腾出了床给我们睡。因为走了一天非常疲倦，所以很快我们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精神多了，我们从心底里感谢这位好心的工人师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工人师傅对人诚挚的感情。

我们走到松江站后，看看到上海的车票只需几角钱，于是我们就乘车到了上海。

到上海一看，我姑妈家被抄了，高继玉母亲的家也被抄了。我们去上海交通大学一看，偌大的校园里，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因为怕被学校发现，我们只过了两夜就马上回到学校。可是已经晚了，红卫兵们已经回校了。于是我们被指责为“黑串联”。写交待、开专题会是那个年代情理之中的事了。

组织长征队

11月份，我们正在郊区虹阳公社下乡参加秋收冬种。一天，从农村的广播中听到大连海运学院的大学生组成了全国第一支长征队进行步行串联。这个消息一传来，就在我们班上炸开了，同学们个个跃跃欲试。学校也通知各班可以返校了。

回到家里，当我向妈妈说我想去参加赴北京的步行串联时，妈妈笑着说：“早就知道我这个小姑娘是肯定要走的。看！”接着妈妈拿出了已经为我剪好的一块军绿色的帆布料子对我说：“就等着你回来量尺寸，叫周家姆妈去做呢！”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说：“妈妈，你真好！”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宿舍，但没人，

我赶快往教室的方向跑去。刚跑到学校的足球场,就看见高继玉、余知信和韩文田三人正低着头慢吞吞地从球场的斜对面走过来。我老远地就喊,并加快脚步向她们奔去。等我跑到她们跟前时,才发现她们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高继玉噘着嘴,边走边用劲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我问班里开始报名了没有?她们说:“已经组织好了。”我说:“那我得赶紧去报名。”听说我要去报名,韩文田只好对我说:“你还要去啊?她们俩个已经被回头(拒绝)出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歧视依然存在。因高继玉的父亲金作镛 1949 年去了台湾;余知信的父亲余叔卿是一位名中医。在沉默了片刻后,我说:“我妈都已经替我去做衣服了,现在是学校允许走的,我就不信,没他们我就走不到北京!”高继玉说:“那我们俩个人一起走!”余知信听我们说要走,她说:“我也跟你们一起走好吗?”看着眼前这位平时沉默寡言、文质彬彬而又肯吃苦耐劳的女同学,她那漂亮的眼睛里充满着对我们的希望。说实在我真不忍心让她感到失望,但想到她那条从小摔坏了、至今走路还有点跛的腿,我们心里不免为她担心。但她坚强地对我们说:“相信我吧!我一定会坚持走到底的,决不拖累你们。好吗?”工人家庭出身的韩文田这时上来说:“那我也跟你们一起走好吗?”听这位平时从不喜欢参加体育运动、娇滴滴的她也要跟我们一起走,我和高继玉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我说:“你也要走?”高继玉说:“是的!她刚才被他们回头出来的理由就是怕她会拖累他们。”我们对韩文田说:“从这里到北京可有两千多里路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一路上什么样的困难都可能碰到的!”她说:“请你们相信我吧!”

既然大家都有决心走到北京,共同的目标把我们四个体质、性

格各异的姑娘汇合到一起，那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吧！于是我们就坐在操场的草地上开了个会，大家统一了一下思想和出去的纪律。大家要推我做队长，我说以我的身体条件会多挑些重担，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为了出去有时要对付那些唯成份论者，我看还是由韩文田任队长好，一方面也给她点鼓励。大家也就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们为自己的队伍取了个名字，叫“继红军长征队”，用红军长征的精神来激励我们把长征进行到底。我们规定大家一律着军绿色的衣、帽和解放鞋行军。和其他长征队一样，我们要有队旗、红袖章和毛主席语录卡、毛主席像。同时规定两个人合一条棉被，一个人背被子，一个人背衣服。我和高继玉是一对。

一切商量好后，大家各自回家准备行装，队旗、袖章等由我负责去印制准备。

11月19日晚上，高继玉到我家来看我，说起她的棉被很重。妈妈马上替我们缝了条丝棉被。妈妈说北方很冷，这样你们可以又轻又暖和。

1966年11月20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也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是我们四个姑娘开始踏上征途的第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当我去向父亲辞行时，父亲给了我一百张明信片 and 一张全国地图，嘱咐我每天给家里寄一张明信片，好让家里放心。家里也挂上一张全国地图，以便每天看看我们所在的方位。这时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父母闯世界呀！父母的牵挂是在情理之中。我接过明信片，点了点头，把它放进了我的书包里。然后，背起了行军包向学校走去。

十点钟左右，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每组的衣服和被子分别重新打包。两个人中，一个人背被子行军包，另一个人背衣服行军包。另外，各人还有一只大书包，里面放着牙膏、牙刷、毛巾、杯子、饭盒、笔记本和《毛主席语录》……等必需的用品。一切准备就绪，约在十二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四个人列队大踏步地走出校门，沿着环城西路方向，向苏州方向走去。

哥哥为妹送宝书

一路上群众设立了许多接待站，大家对我们都很热情。许多孩子看见我们走过去，都从远处跑过来向我们要毛主席语录卡，我们一路走一路发。这也是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行动。

我们一路唱歌一路走，遇到相对走过来的长征队，我们都互相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来致意和鼓励对方。

由于是第一天，又由于心情愉快，不知不觉一个下午我们竟走了40里路。大约在傍晚五点多钟左右，我们来到了江苏盛泽。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城镇，建筑别有风格，房子的围墙很高，弄堂又深又窄，有的地方窄得差不多只能走一个人。我们住进了一家丝织厂的接待站。

按规定，我们每天休息时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可是我翻遍了所有的包、袋，都找不到我那本《毛主席语录》。这下可糟了，在那个年代，不带《毛主席语录》，可是一种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啊！我头上的汗都冒了出来。怎么办？我马上天真地想到请哥哥骑自行车给我送来。我想得很简单：反正我们走路很慢，哥哥骑车可以追上我们的。于是我马上给家里写了第一张明信片。

为了尽量减轻余知信和韩文田的负担，我和高继玉总是轮着一个举队旗，一个捧毛主席像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上时而遇上在田间劳动的农民请我们唱歌，我们就停下来为他们唱歌；时而遇上南下的队伍热情地称我们“红色娘子军”，并向我们致以革命的敬礼！这叫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加上太湖边那优美的景色，真叫人心旷神怡！不知不觉中，我们到达了吴江，那晚下榻在吴江二中。

因为太兴奋了，走路时一点也没觉得脚痛，一直到晚饭后洗脚时才发现自己的脚已经被新球鞋擦起了三个泡。我赶快去看余知信，脚有没有起泡，一看不得了，她十个脚趾上个个起泡了。我吃惊地叫了起来，她赶忙叫我别嚷嚷，为她保密。

第三天早上出发时，我赶快去抢余知信的书包，想减轻她一些负担。可她硬是不肯。我说那我可不为你保密了！她这才肯间歇地让我帮她背包。

按我的想法，昨天家里就应该收到我的信了，那么今天早晨哥哥肯定会马上骑自行车来替我送《毛主席语录》的，因为哥哥是个运动员，平时骑车很快，他准能赶上我们的。

我一路走一路不时地回头望着公路上的车子。我多么希望哥哥会骑车出现在公路上，或者会从汽车里伸出头来叫我。可是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我们走进苏州市还未见到哥哥。

我们来到了人民路上的苏州市接待站，这里人非常多。韩文田去登记后，我们被分配到苏州医学院住宿，到了苏医后又被分配到苏医分部去住。

午饭后余知信陪我到苏州市委去，我想向他们“请”（“文革”时

期，买《毛主席语录》必须说“请”）一本《毛主席语录》。可是他们那里没有多余的语录本，于是，我们就只好到新华书店去买了“老三篇”读本（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

当晚我们就学习了《为人民服务》……

第四天的上午，因为她们三人都有些病痛，我就陪她们一起到苏州医学院的医院看病。下午，我急着要到市接待站再去找找哥哥，高继玉说她陪我去。我急急忙忙地跑下楼去，可是高继玉却在楼上迟迟未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就在楼下大声地喊：“高继玉，快点！”过了一会，突然从我的身后传来一个我很熟悉的声音：“褚离贞！”我想我的身边又没人，我是否在做梦？我回过头去一看，真把我给惊呆了，哥哥就站在我的面前！

原来我的明信片在路上走了两天。家里是在我出发后的第三天上午十点多钟才收到我的明信片的。哥哥估计骑自行车是肯定追不上我们的，因此他马上去汽车站赶上十一点多出发到苏州的长途汽车。到了苏州以后他就到苏州市接待站去找我们。可是因为哥哥只知道我和高继玉俩个人的名字，而我们的介绍信上开的是“韩文田等四人”，因此，接待站的登记本上找不到我和高继玉俩人的名字。而嘉兴一中的学生队伍又很多，都分散在各个接待站。市接待站的同志只好叫哥哥自己到各个接待站去找找看。哥哥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我的足迹，而我却没为他留下任何信息。

当天他找了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找到。晚上他身边没有任何身份的证明，只能去火车站坐着等天亮。11月底的天已经很冷了，到了下半夜每当一班火车开走后，车站里的人都会被赶出来，这时，

哥哥就只能到车站附近的小饭馆去慢悠悠地吃上一碗阳春面，一面暖暖身子，一面消磨点时光，等到下一班候车的人可以进去的时候再到候车室去坐上一会……就这样，哥哥在苏州火车站整整挨了一夜冻。

第二天早上，他早早地又开始一个个接待站挨个地查找着我。当他来到人民路旁的一条小路内的苏州医学院分院，正在传达室查找登记本时，忽然听到我那熟悉的声音：“高继玉，快点！”他赶紧跑出传达室，我们兄妹俩总算相遇了！

听了哥哥的讲述，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好哥哥！

拒绝搭车代步

上路一个星期后，气候逐渐变冷了，我捧着毛主席像的手指有时疼得钻心。她们见我的双手冻得通红，常想来抢捧毛主席像，可我说什么也不让她们抢去，因为我知道经过几天的艰苦步行，目前余知信脚上的泡已经化脓了，高继玉的脚踝关节炎发作了，韩文田走得也很艰难。虽然我也已经觉得有点累，但总算没病。因此我必须多挑些重担。

11月28日中午，我们来到江苏省全州镇，吃饭时刚好遇上一位驾驶员，看我们背着被包，他主动上前对我们说，他的车下午正好要开到句容，可以把我们带过去。他说上午有几位从上海来的同学也是他带过去的。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搭车去，我们说我们不能欺骗毛主席。我们是长征队，我们一定要靠两条腿走到北京。

军营生活奠定思想

参军是我从小理想，然而这个理想一直未能实现。11月29

日中午，我们来到了南京东郊汤山炮兵学院，受到了解放军官兵们的热情接待。

在炮校，我们一共停留了七天半，我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学习“老三篇”，共同谈体会。周立权政委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教导我们要把这次长征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要我们向张思德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向老愚公学习敢于迎接困难、克服困难的精

神。从炮校到南京这段路是周立权政委和我们一起走的。一路上，他教我们上山要用八字脚、要跨大步，下山要走小步，而且上、下山都要走曲线形。由于那段路刚好处于丘陵地带，因此我们就在周政委的带领下特意去“攻克”了一座小山。

分手时，周政委紧紧地跟我们握手道别，并嘱托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

通过这七天半的军营生活，对我们今后的长征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为我们的长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2月10日我们离开南京。跨过了长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色与江南有着明显的区别：人越来越少了；绿色植物越来越少了；盐碱地多了；铁路两边的山多了。沿铁路线也不太好走，而且站与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长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接待站。但北方人十分热情好客，沿途的群众有些在自己的家里让出床铺来接待我们。走到小王营车站，那里已经久旱无雨，地里的蔬菜都干死，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但是工人们还是热情地拿出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腌白菜来接待我们。事后当我们知道真情的时候，真是感激不

已！

12月14日早晨起来，看见外面已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这是我们长征途中第一次遇到下雪。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就起来赶路了，从光明到临淮关共赶了74里路。第二天，天下起了蒙蒙细雨，路很泥泞。这段行军可以说是我们长征途中一段很艰辛的行程。因为我的雨衣破了，衣服都湿透了，受了风寒后的我终于发烧了，走起路来只觉得头发晕，两腿无力。这时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我们大家都闷着头无声地走着。我看看余知信实在是走得很艰难的，可她总是一声不响地紧跟着我们，她的处境比我艰难得多了。于是我就上前去把她的书包抢过来背了，这样一来，人虽然吃力点了，但心情却感到好多了。这一天，我们在泥泞中赶了60里路，来到了蚌埠。

因为天下雨，我们在蚌埠休整了两天。刚好遇上蚌埠的学生和工人在发生武斗，急于赶路，我们很快又冒雨出发了。

刚走出蚌埠市区，渡过淮河，余知信在跳一个缺口时滑了一跤。一位农民大爷见状，赶快放下水担来为我们填好了缺口。我和高继玉忙着去扶余知信和韩文田，一时间也忘了去谢谢那位大爷，等我们想起来时，看到他已经走远了。

那天因为有同学病了，我们只走了28里路就早早地休息了。

参加新边湖水库工程的劳动

12月21日清晨起来，天下着鹅毛大雪。为了急于赶路，我们还是冒雪从龙王庙出发，向今天的目的地——符离集挺进。下午两点多才赶到一个小县城——宿县。我们在街上买了两只馍馍填饱了肚子，就继续上路。由于雪下得比较大，加上旅途的疲劳，大家都

闷着头走路，没有注意旁边的景色。当我们走过一座铁路大桥后，只听到人声喧闹起来。抬头一看，只见有许多人在推车劳动，场面好热闹啊！看起来这是一个什么大的工程在建设。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这正是我们学习愚公移山精神的又一个机会。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去参加工地大会战，体验一下工地的生活。

我们来到了工地指挥部，问明了这是新边湖水库工程，是江苏、山东、安徽三省合建的工程，因此工程浩大。我们向他们讲明了来意，受到了指挥部同志的欢迎。我们四个人被分配到两个连队，我和高继玉分在四连参加劳动。三天来我们和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正使我们体会到北方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劳动人民纯朴的感情。我们离开时，连长殷秀英送我们上路，她是流着泪来送我们的，彼此间依依不舍。

微山湖之行

随着北去的行程，天气越来越冷。过了淮河，气温已经低到零下13℃左右了。天气时好时坏，有时逆风前进，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12月29日，天阴。这天上午，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碧波万顷的湖边，湖边有个“韩庄节制闸”，这个闸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比较气派的闸站。闸一边的河道内已经封冻了，有几个小朋友正在冰上滑冰。我们就向小朋友打听这叫什么湖？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微山湖”。

少年时代曾经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中铁道游击队员们那种机智勇敢的战斗作风和飞车走壁的本领令我们十分钦佩；影片的主题歌——《铁道游击队之歌》是一首激励人们革命斗志、

脍炙人口、十分动听的革命歌曲；那神秘的微山湖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地方。因此，一听说这是我们在电影中熟悉的微山湖，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唱了起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完了又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当晚在韩庄接待站听了老游击队员殷延兰和李凤清两位前辈的回忆报告，这更激起了我们想急于到微山岛上去看看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看看老区人民生活情况的热情。

12月30日早晨起来，开门一看，屋外已是一片银色的世界了。从韩庄接待站到上微山岛的摆渡口还有相当一段路，我们顶风冒雪赶到摆渡口。岸边只有一二个人，未见有摆渡船，等了很久还不见有船来。我们嘀咕着今天下那么大的雪，能有摆渡船过来吗？熟悉情况的人说会有的，要耐心地等。我们在大雪中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听到吱嘎的摇船声由远而近。

这是一条不大的双划桨摆渡船。等我们都跳上船坐稳以后，摇船大爷就把船推离了岸边。渐渐地，渡口的景色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四周望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天还是不停地下着大雪，只觉得湖面上静得出奇，仅听得见吱嘎吱嘎的船桨声和水的拍击声。我心想，有这么大的天然屏障，确实是一个作战的好地方。不过，说实在的，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大家心里都有点后怕，我连自己的心跳声也能听出来似的，大家都放低了声音说话……我担心地问：“大爷，这望去什么都看不见，你能摇到岛上吗？”大爷肯定地说：“能！”高继玉说：“他大概是凭经验。”……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大爷指给我们看，前面那个隐约可见的地方就是微山岛……

一上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座又矮又小的小土屋。我们

走进大队部的办公室，只见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我和高继玉被领到妇女主任孙金兰的家中去住，余知信和韩文田被领到另一户军属家去住。

北方的农村，冬天没什么活干，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烤火，副业搞得很少。水面虽然很大，但是养鸭子的人几乎没有。听说天热时有许多野鸭子飞过来栖息，岛上的人用鸭子粪作肥料。

雪下得很大，这是一场三年未遇的大雪。我们和贫下中农们一起到外面去抬雪，挖出了一条条象战壕一样的路。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孙大妈端出了热气腾腾的白米粥和香喷喷的红薯，这红薯可甜了，我们很喜欢吃。看着我们吃得高兴的样子，大妈和隔壁来的大爷大姐们都很开心。我们请他们也来吃红薯，他（她）们笑着说：“这红薯是我们一年四季的主粮，我们已经吃腻了！”“这个当饭吃？”我们瞪大了眼睛问。“是啊，有时候红薯吃完了就只能用红薯叶子当饭吃，有些人家连叶子也接不上吃。”大姐对我们说。

用红薯当饭吃，这在我们嘉兴恐怕只有在1960年困难时期才听到或体验过。在过了六年后，经济已经好转的情况下还会有那么苦的地方，这是我们几个江南小姑娘所没有料想到的，我们的心情有些沉重了。

在一旁的大爷说：“怕你们吃不惯红薯，今天烧粥的米，她是用军属优待券去买来的！”孙大妈在一旁眯着眼睛高兴地看着我们。“大妈，我们喜欢吃红薯，您下回可千万别给我们任何特殊的招待，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体验一下老区人民的生活……”我们急忙请求大妈。大妈笑着说：“来看看就好，来看看就好！”

在岛上，我们甚至看到一户有五个孩子的七口之家，全家只有一条棉裤，白天谁到屋外去谁就穿这条棉裤，其他的家庭成员只能盖着麻袋御寒……

从微山湖出来，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们多么希望昔日游击队之乡的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啊！

死里逃生

走出徐州以后，天气越来越冷了。再加上风大，我们只好用围巾把头裹得严严的，再戴上个大口罩行军。每天沿着铁轨走路，北方的风景也看惯了，也没什么新鲜感了。一天，我们闲得无聊，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要大家来数铁轨下的枕木。韩文田没参与，她一个人在铁轨旁走。我们三个在铁轨上比赛谁走得快，我得意地走在第一。高继玉因为下乡劳动时把脚踝的韧带拉伤了，因此在长途跋涉中发作了，走起路来也很艰苦，她落在最后。突然我们听到高继玉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火车！”我赶紧跳下铁轨。向后一看，高继玉和余知信已抱在一起坐倒在铁轨边。火车迅速地从我们眼前呼啸而过，列车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我们。等火车开过以后，我们方才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前面一位扳道工人大叔正冲着我们走过来，他一边走一边在呵斥我们：“小鬼找死啊？喊你们也不听见的啊？”原来我们包了头巾听觉本来就差，再加上那天又是顶风在走，因此后面火车的呼啸声我们根本没听到；又因为我们只顾低着头在看枕木，数数字，因此前面大叔的喊叫声我们也没注意到。直到走在最后的高继玉感觉到脚底下的枕木有点颤动，她回头看时已经是见不到天和地，只看见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这才发生了刚才紧张的一幕。